

# 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哲学透视

张杰克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青年毛泽东对“力”观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物力”“体力”“心力”三重向度。就国家层面而言,“物力”的进步将带来国力的增强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就个体层面上说,“体力”是个体存在的直观确证,“心力”则进一步对个体的存在方式作出形上追问。他对“力”观念的哲学沉思旨在从社会历史动力的追寻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双重维度展开,不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作出哲学思考,而且有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可能的前驱探索。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物力;体力;心力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5-0001-08

以“力”为视角解读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以往学界有所忽视的。有学者以“动”“斗”为线索,窥见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活跃的“力”观念:“毛所理解的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也就是‘宇宙真理’。从毛青年时期的《讲堂录》(1914—1915)、《伦理学原理批语》(1917—1918)或《体育之研究》(1919)等来看,‘动’、‘斗’是毛的这个‘宇宙真理’中的核心观念。”<sup>①</sup>许全兴较早地以儒家传统的“和”与“中庸”思想为反视镜,观察到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力”因子,同样讨论了他的“斗争哲学”<sup>②</sup>。美国学者魏斐德也把“斗争”奉为毛泽东全部思想、活动的基础,指出“我们早已知道,他是那样普遍地强调:斗争是自然的绝对法则”<sup>③</sup>。以尚庆飞所见,近年来,亦有部分国外学者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予以关注,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侧重于以青年毛泽东思想论证其晚年的理论和实践<sup>④</sup>。高瑞泉曾就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进行社会动力学的诠释,他认为斗争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价

值,不仅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类的社会生活”<sup>⑤</sup>。在对“斗争”的动力性价值厘定中,他洞见了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某种源头。因此,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研究尚留下较为充分的讨论空间。

青年毛泽东以“物力”“体力”“心力”构建了“力本论”的思想体系。“物力”“体力”关涉“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之问,“心力”指向“中国向何处去”的形上之思。具体而言,“物力”的内涵是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富国强兵的国家追求;“体力”指身体的力量,是个体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心力”指意志的力量,即“心”的创造性作用。从理论意义上说,对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研究不仅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观照其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程中的演变。就实践层面而言,青年毛泽东的“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性问题作出了深切回应,同时也为“中国现

收稿日期:2023-06-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ZX03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ZXB005)

作者简介:张杰克(1984—),男,安徽太和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②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③魏斐德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郑大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④尚庆飞:《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若干趋势的分析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⑤高瑞泉:《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页。

代化”的建设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 一 物力的勃兴

近代西方文化中凸显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和“物力论”推动了“物力”观念在中国近代哲学的登场,儒家正统“义利之辨”的价值翻转也为物力观念的勃兴提供了本土思想资源。从历史上看,魏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中已蕴含对“物力”的向慕。在“物力”的统摄下,“公理”逐渐驱逐“天理”,“德”的秩序逐渐让位于“力”的秩序,竞争法则取代道义原则成为支持文明进步的主流价值观。在寻求富强的现实指引下,对“物力”的渴望和追逐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已成普遍共识。

### (一)“物力”与“富强”的关涉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中国向何处去”时代之问的回答首先指向“物力”,并因此绘就了以“寻求富强”为先导的现代化运动宏图。

钱穆先生曾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思潮作如是概观:“‘唯生主义’与‘唯物主义’,乘机崛起,弥漫一世……人类文化,最多亦仅止于各凭物力‘互争长雄’。而其所争,亦终不出‘物’与‘力’之阈域。用物多,拥力强,是为胜利;用物少,拥力弱,则为失败。”<sup>①</sup>唯物主义哲学的兴起与物力观念的勃兴,自然是“西学东渐”视域下的产物,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明清之际的裂变也为物力在中国近代哲学的登场提供了传统理论资源。

响应“救亡”的时代主题,青年毛泽东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他受戊戌时期思想家影响很大,康有为提出“物质救国论”,把昌明“物力”作为富强之道,认为“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大地者,非其哲学之为之也,又非其民权自由致之也,以物质之力为之也”<sup>②</sup>。梁启超同样重视物力问题,早在1897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中,便表达了对“物力”富强的诉求。针对太史公以农虞工商四者为“民所衣食之原”一语,其

释读曰:“原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sup>③</sup>杨度的“金铁主义”也曾风行一时,他希望通过实现“金铁主义”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所谓“金”即黄金、金钱亦即经济力量,“铁”即黑铁、铁炮亦即军事力量。青年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关切。在写就于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中,他赞扬商鞅变法,称“法令”为“代谋幸福之具”,并提出以增进“富力”为“利国富民”之大道。当然,在此时的自然经济背景中,增进“富力”的手段仍与农业生产挂钩。早年与张昆弟等在昭山寺夜谈时,毛泽东便已注意到物力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救国抱负的必要性,强调只有解决物力问题才能达到“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sup>④</sup>。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生产力观念逐渐取代物力观念。把经济问题置于实现理想之前,表现出青年毛泽东对“物力”的重视。虽然彼时毛泽东尚未接受唯物史观,但已认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有裨于理想之世界主义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其原始定义上,生产力即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及社会的活动能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青年毛泽东尤为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提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sup>⑤</sup>

“物力”的另一面向是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可以视为国家有组织的“暴力”。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且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实践之后,毛泽东承认“暴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并把“暴力革命”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战争的实质是“军事力量”的竞逐和较量,“战”之一字即意味着斗争,彰显着强烈的力量感。《讲堂录》中收入“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一语,表明了他对“兵”的普遍性、军事力量的重视。青年毛泽东注意到“抵抗”之于人类

①钱穆:《文化学大义(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②张荣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康有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③汤志钧:《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启超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2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并肯定“动乱”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必然性,以为治乱迭乘、和战相寻是“自然之例”,把“乱”视作“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sup>①</sup>。他肯定差异、斗争、动乱等看似负面的状态在历史活动、演化过程中的合理性,赋予对立、冲突、竞争以积极意义。

## (二)“物力”与“德力”的紧张

“德力之争”是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中的主要论争之一。在正统儒家价值体系中,“力”的价值排序远逊于“德”。质言之,“力”观念在中国哲学大传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近代以还,“德力之争”被“力理之争”所取代,“力”(物力)与“理”(德力)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展开为“强权”与“公理”的对峙。比如林同济就认为:“有理不必有力,有力才配说理。”<sup>②</sup>

在接受唯物史观前,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时现某种二元论的倾向,其认识论上隐含着唯物(物质主义)与唯心(观念论)的犄角,经常徘徊于物力与德力之间。关于国家层面“物力”与“德力”的紧张屡见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在国家层面上,“物力”一般涵盖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即“硬实力”,“德力”则表现为道义原则,即“软实力”。有关军事力量的讨论向来无法回避战争,诚如前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物力”的较量,因此,战争本身就在激烈的语境下反映了“德力之争”,亦即国家层面“物力”与“德力”的紧张。在近代(尤其是民初)中国思想界,“道德救国论”一时风头无两,而“战争中关于物质之力的讨论终以道德为落点”<sup>③</sup>。各家理论虽殊途,但都主张从道德处着手,改造国民性,甚至认为国力强弱取决于德力盛衰。在多变叠涌的时代思潮和中国“德治”传统的双重影响下,青年毛泽东首先注意到“德力”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中,他虽承认客观生活的存在,但其并未明确客观物质力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转而代以观念的力量诠释社会历史进程,主张“道德哲学在开放时代尤要”<sup>④</sup>,认

为一切人类文明都由道德观念所统辖。

在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思想中的“物力”因子进一步活跃起来,原先抽象的“德力”延拓至种群竞争求存的“物力”。在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这正是其青年时期的“物力”思想在唯物史观规范下的自由表白。

毛泽东虽高呼集中发展“物力”,但并未轻视或弃绝“德力”的作用,他不仅承认物力富强的价值,而且更深入地从德力之维洞见实现富强的现实可能。他强调“确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其对党内思想建设、党员个人品德修养及世界观改造的重视与其青年时期是一贯的。在此,毛泽东为斡旋“德力”与“物力”的颉颃,铺设了一条“力”(竞争之物力)与“理”(进化之德力)二者得兼的富强之路。在他看来,物力竞争不应以德力的失落为代价,物力与德力应并行不悖,在“物力”发达的基础之上完成“德力”的升华,共同创设人类文明进步之途。

从“力”的视角观照,作为实存的个体之所以成其自身,其肯綮便在于体力的发萌。人的身体属于广义的物质范畴,在此意义上,体力可以视作物力的一大外延。当然,与“物力”所涵摄的宏观客体(即国家)相异,“体力”所指的是主体性存在的个人。

## 二 体力的超拔

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有显著区别的一点就在于其对体力的重视,尤其是对身体力量的重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很可能与他出身农家,少年时期经常从事体力劳动有关;自理论渊源观之,这与强调体力劳动的墨家思想以及颜元哲学有诸多相似之处<sup>⑤</sup>。青年毛泽东的体力观自有其哲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传统哲学“心体之辨”作出的新的诠释,而且隐含着对“动静之辨”的新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②张昌山:《战国策派文存(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

③张帆:《“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第111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思考。

### (一) 心体关系上的“调和论”立场

在传统哲学“心体之辨”中,“心”大多居于主导地位,形上之维的“心”绝对地主宰形下向度的“体”,于是遂形成重“心”轻“体”的柔性文化传统。孟子所言“心之官则思”意味着“心”乃思虑之主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劳心”即精神劳动,“劳力”即体力劳动,由此明显表现出重视精神劳动的倾向。近代以降,康有为以“有知”“无知”分别“心”与“体”,主张“心贵于体”,同时还强调“言议”“觉议”即观念所具有的改变人心、移风易俗的力量。

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受理学唯心主义影响,极力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将宇宙本体视作精神性的存在,称“人心即天命”,“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sup>①</sup>。另一方面,毛泽东早年的文章中也提出诸多“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将精神与物质、心力与体力等量齐观,强调“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sup>②</sup>,认为心力与体力相互配合有助于成就人生事业,表达了其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心体调和论立场。

青年毛泽东尤为重视体育锻炼,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表达了对“体力”的高度关注,认为当时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众身体羸弱的现实与时人轻忽“体力”有关,并以自身“由弱转强”的经验证明体育的效力。个人身体的强弱不单具有生理性的意义,在“救亡”主题的逼促下更被纳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成为一个社会性、民族性的符号。在毛泽东看来,“体力”的强健不但与个人身心健康休戚相关,而且关涉民族存亡。职是之故,其赞同“军国主义”所提倡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口号。

早在1916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阐述了体魄的重要性,将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拟配近现代所倡导的“智德体”三育,强调身体素质的强弱与人的道德、智力的发育有密切关联,把身体视作道德和智力发展的载体,认为“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sup>③</sup>。并

引颜渊、贾谊、王勃为例,说明体质的强弱关涉人的寿限,而身体的衰亡必然导致德智的消解。

青年毛泽东推崇颜李学派“文而兼武”的思想,反思并批判“薄志弱行”的现象,有鉴于学校教育偏重智育的弊端,他呼吁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并揭示体育活动之于精神的重要性和“身”之于“心”的自由,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筋骨”,而且可以“强意志”“调情感”。在他看来,体育的主旨是“武勇”,诸如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等都是“武勇”的条目,也是意志的内容。意志是人生事业的先驱,而“武勇”是内在意志力的发显,其既有“心力”的意味(表现为一种精神),又有“体力”的特征(外化为某种行为)。

青年毛泽东主张人生价值在于自我实现,而身体是实现自我的重要前提,其认为通过体育运动可以使“至弱之人”进于“至强”,达到“心身并完”,实现体魄与精神的高度和谐。由是观之,“体力”之于“心力”具有基础性意义。毛泽东还指出,体育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往往使受教者身心俱疲:“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sup>④</sup>“精神”即人的意志力量,其主导、驱动着身体的活动。“有力”是内在于主体自身的禀赋,而“用力”则是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毛泽东以变易观看精神,以机械论看肉体,谓前者“时时有变化”而后者“万年无变化”,“精神苦而身亦苦矣”,说明精神相对于身体具有兼容性。质言之,在毛泽东这里,精神(即“心力”)同样带有体魄性(“体力”)的特征。

### (二) “动”“斗”的宇宙人生观

中国文化大传统以“和”为贵,尚“柔”尚“静”。原始儒家虽有刚健主动的精神传统,但总体观之,“虚静”仍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19世纪中叶以降,“动静之辨”慢慢发生了一种价值翻转,总的趋向是人们越来越追求“变革”(“动”),同时“力”的地位迅速上升。新文化运动扫清了一切旧思想传统的束缚,使人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号召“作成一种奋斗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的和向上的人生观”<sup>①</sup>。

青年毛泽东将“动”视为宇宙间存在的普遍规律。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写道:“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sup>②</sup>意即是说“动”是宇宙的本质,正与梁启超的《说动》之论相桴鼓。毛泽东曾坦言从前主张“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讲堂录》中遂宣称“我即宇宙也”。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宇宙观即人生观,人生观亦即宇宙观。质言之,他对宇宙运动的阐释是为了论证人格主体运动的合理性。既然宇宙的本质在于“动”,那么人生的意义亦在于此。

“豪杰之士”是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sup>③</sup>由此断定“动”是人格的本性,“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如何在现实中发显“动”的“人格之源”,毛泽东关于“体育之研究”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毛泽东认为:“讲体育必自动始。”<sup>④</sup>他所讲的“动”首先是指“个体的客观身体活动”,即与劳动和体力密切相关。体育自然尚“动”,于“动”中激发人的本质力量,“动”确证了“力”的身体性存在。“体力”是“动”的载体和本质,“动”是“体力”的条件和表征;由“动”必然产生“体力”,“体力”总隐伏着“动”的欲求。“动”的内涵有两方面:就宇宙观而言,是指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从人生观上说,则表现为主体的活动和斗争性。人作为动物性的存在必然“尚动”,“动”可以养生悦心,生发兴味,增进身心生活之幸福。在运动中可以发现自身的价值,获得精神、情感上的满足。由此不难看出,运动、斗争构成毛泽东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sup>⑤</sup>。

“动”与“斗”如影随形。青年毛泽东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音符谱写了一曲

“其乐无穷”的青春赞歌,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完成了最后的铺陈。青年毛泽东一贯推崇斗争精神,强调依靠斗争来实现理想世界图景,运动、奋斗构成其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他还对斗争作了浪漫主义的发挥,赋予其审美价值:“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sup>⑥</sup>在毛泽东这里,斗争已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价值原则,人生的意义正在于无止境的奋斗和抵抗。这种对斗争、变动的向往浇铸了青年毛泽东独特的精神气质,成为其解决思想困惑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动”“斗”的宇宙人生观思想发萌为他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所建构的比较完备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认识论奠定了哲学基石。“毛青年时代的‘动’、‘斗’观念结合经验理性构成了比较完备的辩证法(后来表述为《矛盾论》),同时也由于经验理性,形成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后来表述为《实践论》)。”<sup>⑦</sup>

### 三 心力的高扬

较之物力、体力从现实层面发微,心力就是对人和世界的终极存在作出深度追问。在传统哲学视域中,“心”是创生宇宙的本体和经验世界的终极根据,是创造世界的终极力量。“心力”即意志的力量,乃“心”的创造性显发。青年毛泽东受陆王心学影响较深,尝曰:“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sup>⑧</sup>这与陆王心学是同样的论调,流露出唯心主义的致思倾向。在《批注》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其“心力”说。

#### (一) 自我:心力的本体论意义

伴随着“自我”的觉醒,“心力”在中国近代哲学中正式登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谭嗣同试图“以心力挽劫运”完成国家富强的哲学辩护。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高扬心力。章太炎以“依

①《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自不依他”为主臬,强调“自力”。这展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革命气概和理性主义精神,也构成青年毛泽东“心力”说的哲学背景。

“自我”或“心力”内在关涉“个体”或“个人”的观念形态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和演变。青年毛泽东重视主体人格,主张“唯我论”,强调“以我立说”,突出“自我”的优先性,追求立足于“实现自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有“百般之价值”“无上之价值”<sup>①</sup>,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同时,他又主张“我即实在,实在即我”<sup>②</sup>,认为“个人”“自我”与宇宙、社会、国家同构,发显乃至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将“自我”提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这种夸大心力、力挺自我的观点,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决心冲破封建精神枷锁、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这在当时颇有见地。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过度高扬心力难免陷入唯意志论的窠臼。

毛泽东之“我”或“自我”,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创造世界的主体,并非“天命”或“天理”的从属。从狭义上说,“我”即人的主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我”类似于康德的自由意志或王阳明的“灵明”“良知”,突出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特别是意志力量。借助于“我”(即“心力”),便可以脱离无自我意识的“庸人”之列,成为“豪杰之士”。当然,他同时也承认“自我”(心力)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依赖性,谓:“自我之构成——皆须待外界之资料,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sup>③</sup>规定了“自我”即“心力”的限度。

## (二) 知力:心力的认识论意义

毛泽东肯定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知识是人禽之别的肯綮。他反对泡尔生贬低知识地位的观点,指出知识对于人心动作大有影响。“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sup>④</sup>知识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皆离不开知识的范导。

毛泽东将知、情、意三者纳入“心力”之中,将知、情、意作为个体精神活动的三大步骤:“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sup>⑤</sup>他一方面强调道德哲学之正鹄“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sup>⑥</sup>,另一方面却又言“知识有助于意志”<sup>⑦</sup>“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sup>⑧</sup>。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青年毛泽东主张经验论,不同意康德的先验直觉论。五四运动以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发展了这种重视经验、注重“行”的唯物主义倾向,“终于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认识路线和思想作风”<sup>⑨</sup>。以此观之,青年毛泽东的“心力”观颇具张力。

知识直接关涉志向的确立,“立志”关涉知行之辨。在毛泽东看来,“志”是定鼎事功的重心,支配人的一切活动。“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sup>⑩</sup>立志不能盲从,须先从哲学、伦理学入手领悟“宇宙之真理”,坚定个体所从事的事业、行动的方向和准则,志向一经确立便具有确定不移的趋势和现实性的品格,指向理想人格的成就,能够成为人视听言动的标准。毛泽东认为,立志首先应当树立真善美的根本理想,还应在所获真理性知识的指引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摆脱了消极反映论的迷误,发展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科学地回答了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心物(知行)”之辨。

## (三) 德力:心力的伦理学意义

在《批注》中,毛泽东屡屡提及“良心”“良能”等伦理术语。“良知”“良心”皆为“心力”的不同表述,借以阐发道德自主和意志自由的诉求。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⑨金邦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及其世界观的转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在此意义上,“心力”道德属性(即“德力”)的发萌与主体自由意志的发挥不无关联。“德力”既是人之为德性主体的意义探索和目的指向,又是人之为实践主体的真理追求和价值创造,为成己成物创设了可能性条件。

青年毛泽东区分了“主观之道德律”和“客观之道德律”,尤为推重前者。他强调道德律必须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上,不能建构在任何客观外在的规定或事物上。这流露出一种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倾向。其不同于正统儒学讲的以“孔颜之乐”为标准的道德境界,颇近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体力量、意志、行为、活动的完满实现”<sup>①</sup>。

“心力”的“冲动”、“动力”是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中所聚焦的核心观念。他把自然冲动和义务感情集注于心的基础之上,认为“精神在利情与意”,并将意志、情感与本然之冲动相结合,肯定自然冲动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有鉴于意志、良心和冲动同出一源,毛泽东反对“盲目之道德”,强调道德实践须经由主体权能的承诺。对道德的追求并不排斥感性欲望的满足,恰恰相反,情感真实自然的流露是道德进步的重要途径。真正的道德并不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而必发于意志的自主和自为,以内在的冲突为特质的道德只是虚伪的教条。

要而言之,青年毛泽东并未对“实现自我”的“主观之道德律”展开充分论说,关于“实现自我”何以能归属于“道德”及“实现自我”的“冲动”或“动力”的衡量标准、价值取向亦尚未有详尽合理的阐发。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革命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 (四)民力:心力的历史观意义

高瑞泉曾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动力的追寻’,并且由此经历一场价值观念的变革,才可能与西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文化处于对等竞赛的地位。”<sup>②</sup>“动力的追寻”贯穿毛泽东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便表现出对“民力”的重视。

他既推崇能够“抵抗极大之恶”“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的圣贤豪杰,也不否定具有发达身心能力能承担社会责任、成就理想人格的普罗大众。

青年毛泽东对“民力”的观照集中体现为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的重视,其中隐含着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及其历史创造力的认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都使毛泽东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民众的大联合”才是完成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

群众的共同意志即所谓“公意”,亦即各人“心力”的集合。“公意”不是各人意志的简单叠加或追求大体的“普遍同意”,而是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大同团结”,是承认“大同”和尊重“小异”的有机统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亦即要求把理想人格融摄于理想社会的实现进程中,创设出一个既讲求自由又秩序井然的世界。这可视为青年毛泽东对“群己之辨”所作的最新诠释,亦是其日后提出“群众观点”的先声。

顾红亮指出:“在‘群己之辨’上毛泽东提出群众观点,其中蕴涵的一个意思是尊重群众的个性。把群众看作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特点和意志自由的个体。”<sup>③</sup>毛泽东在后来革命斗争中更加深化了对群众力量的认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④</sup>他主张引导、团结、凝聚各革命阶级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以此推进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质言之,毛泽东的“民力”观关乎造成日后“中国崛起”奇迹的“秘密”,在解决各种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彰显了极其强大且独特的中国力量。

#### 结语

冯契先生曾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sup>⑤</sup>考察青年毛泽东的“力”观念亦可折射出此转变的心路历程。

伴随着“西学东渐”与传统价值观的内部裂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②高瑞泉:《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③顾红亮:《个性的显现与遮蔽——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⑤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3页。

变,“力”作为西方现代性尤为推崇的观念开始登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舞台。青年毛泽东以“物力”“体力”“心力”建构了“力本论”的哲学体系,试图回答“中国向何处”的时代之问。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便进一步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可能。在这一意义上,青年毛泽东的“力本论”思想可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驱探索方案。他的“物力”观对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调构成对物质文明的渴望,由“物力”观进一步衍生的“体力”观则表达出对“人的现代化”的关照。青年毛泽东疾呼“物力救国”的同时,也

意识到纯粹的“物力”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便试图以“能动的心”来回答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问题,由此建构出“心力”观。

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角度看,青年毛泽东“力”的观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动力性理论支撑,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动力性文明的基础。“物力”“体力”“心力”共同构成青年毛泽东“力本论”思想的基本内涵,而这三个维度又分别展开为不同侧面的冲突,其中既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洞见,又留下了一些尚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Youth Mao Zedong's Concept of “Force”

ZHANG Jiek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Youth Mao Zedong's concept of “force” mainly focu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force, physical force, and mental for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force will lead to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power and the elev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u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hysical force is a tangible affirmation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while mental force further questions the manne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metaphysically. The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force by youth Mao Zedong aims to unfold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exploring social historical dynamics and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not only philosophically defends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the era, namely where China is going, but also carries a thoughtful tendency regarding how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ight be possible.

**Key words:** youth Mao Zedong; material force; physical force; mental force

(责任校对 朱正余)